

文德泉神父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張廷茂*



文德泉神父在介紹澳門天主教會藝術藏品（1994年）

16世紀中期以降，隨着葡萄牙人的駐居，澳門這塊中國南海之濱的彈丸之地，逐漸成了一片“世界性的土地”，“世界性的海洋”。⁽¹⁾四個多世紀裡，澳門不僅在溝通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聯繫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而且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正是澳門歷史所具有的獨特魅力，使得她長期以來成為中外學者關注的對象，激發了他們無窮的研究慾望。僅以剛剛過去的20世紀而言，就湧現一批具有世界影響的史學大師，在澳門生活了六十餘年的葡萄牙史學家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便是其中之一。值此文神父逝世一週年之際，特撰此文，以表紀念。

生平簡介

1912年4月15日，文德泉出生於葡萄牙後山省（Trás-os-Montes）的埃斯帕達·德·弗雷舒鎮（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在家鄉完成了最初的學業後，文德泉於1924年9月16日踏上了通往東

方的航程。當時他才12歲，是前往東方各傳教區的神學院寄宿學員中最年輕的一位。經過一個月的航行，文德泉於10月27日來到了澳門，進入了澳門的聖若瑟神學院，修讀哲學和神學課程。入學後的第一年，在法籍教師熱爾韋（Padre Régis Gervais）⁽²⁾的影響下開始對歷史學產生濃厚興趣。此後十年間，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澳門中央圖書館珍藏文神父自 1937 年迄 1999 年所著出版圖書已有 130 種及其在各種刊物上發表的文章 305 篇

文德泉潛心投入搜集資料和研究工作當中，並在葡萄牙語和拉丁語方面顯示出了傑出的才能。

1932年7月24日，20歲的文德泉在澳門主教堂接受了由努內斯主教（Bispo D. José da Costa Nunes）為其主持的落髮式並領受了低級教職。次年7月29日，在聖若瑟修院教堂由萊洛斯主教和香港代牧主教瓦托爾塔（D. Henrique Vatora）授予副助祭職位。1934年10月29日，由努內斯主教授予他神父職位（Presbiterado）。是年11月1日，他在聖多明我教堂進行了首次彌撒。也就在這一年，22歲的文德泉擔任了聖老楞佐教區的教區神父（pároco），直至19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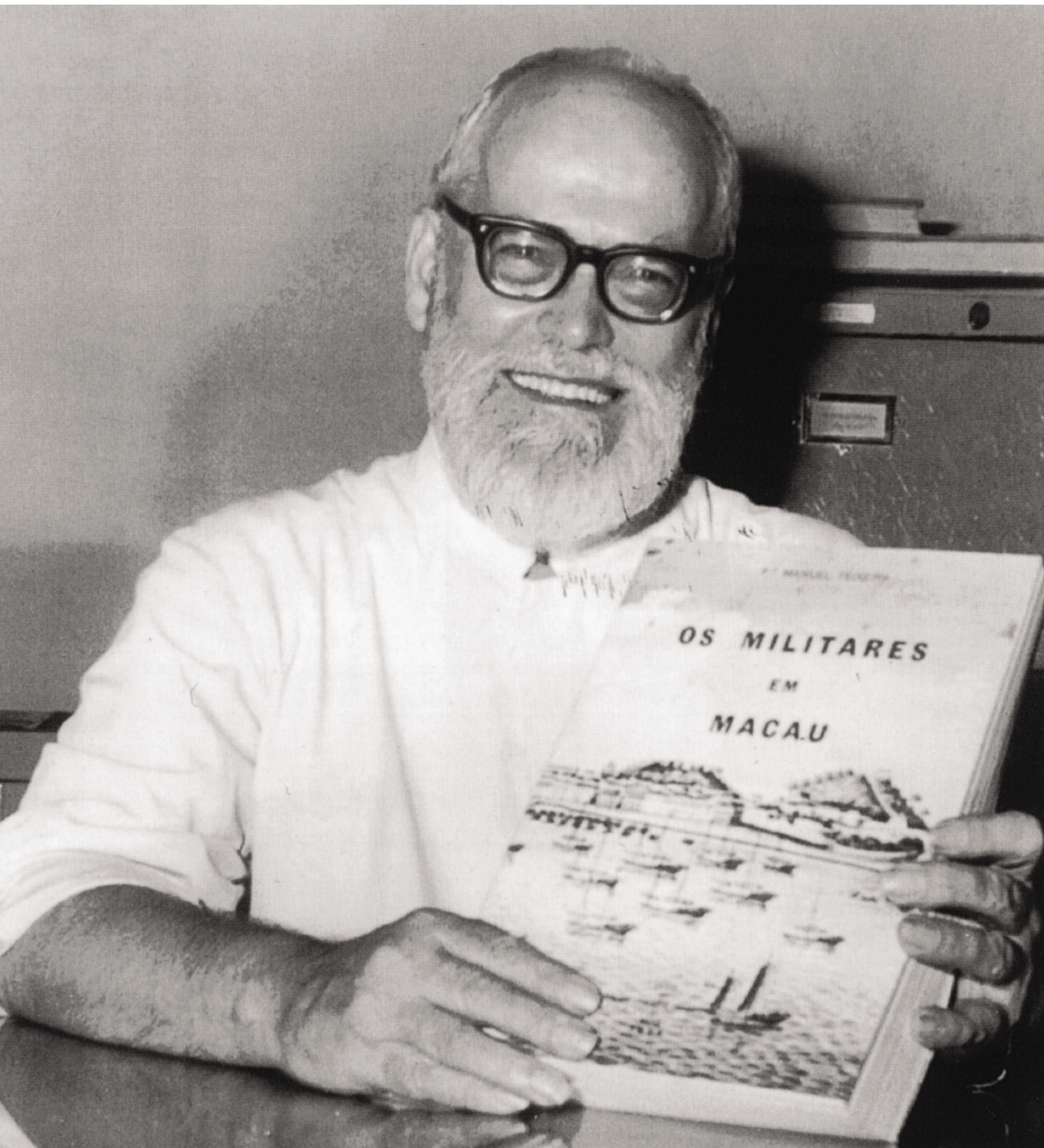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文德泉受命主持《澳門教區月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直至1947年。他還前後兼任聖若瑟學院（1932-1946）和利宵中學（1942-1945）的教師。1942年，文德泉創辦了《號角》（*O Clarim*）月刊⁽³⁾，並參與創辦了國際聯盟機關刊物《聯合》（*União*）週刊。

1946年，闊別家鄉二十二年的文德泉返回了葡萄牙。兩年後，在出版了二十種有關澳門歷史的著作之後，文德泉前往新加坡，出任新加坡、馬六甲葡萄牙教區的修道院院長和代牧主教（Superior e Vigário Geral），直至1962年。其間，他在當地建立了多個宗教機構，創辦了《團結》（*Rally*）雜誌，並從1950年9月至1952年11月以“聖約瑟夫教堂”為題，在該雜誌刊登了新加坡葡萄牙傳教區史。1954年，文德泉創辦了新加坡聖若瑟教堂教區月刊《停，看，走》（*Stop, Look, Go*）。在新加坡十四年的文化活動期間，文德泉出版了十多種著作。鑒於他的出色表現，葡萄牙政府海外部於1952年授予他殖民帝國勳章（*Oficialato da Ordem do Império Colonial*）。值得一提的是，這十四年的生活和工作使他的生活習慣有了很大改變，養成了喝威士忌酒的習慣。這種被稱為“蘇格蘭茶”（*o chá da Escócia*）的酒，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成為文神父的首選飲料，然而他從未喝醉過。後來，到了接近80歲高齡時他才戒掉威士忌飲料。



青年文德泉與奧古斯都師弟（1931年）

1962年，文德泉返回澳門，轉而從事教師職業，分別執教於聖若瑟學院（1962-1965）、諾拉斯科商業學校（1962-1964）和殷皇子公立中學（1964-1970）。此後，文德泉同時出任《澳門檔案》（1976-1980）⁽⁴⁾和《賈梅士學院院刊》（1976-1980）的主編。他是多個民間和宗教團體、機構的成員，自1962年起擔任聖嘉勒修道院的教堂神父，直到他2001年返回葡萄牙為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期間，文德泉曾與潘日明神父（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等人一起，通過艱苦的鬥爭，從“造反派”手裡挽救了瀕臨毀滅的澳門市政廳檔案，並重組了議事會檔案館。這項活動對保護澳門的歷史文化遺產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



文神父及其鉅著《澳門的軍人》留影（1994年）



文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院書房裡著書立說（1994年）

1974年，文德泉神父獲得了殷皇子勳章。1981年，古本江基金會給文神父的重要著作《澳門的軍人》（*Os Militares em Macau*）頒發史學獎，兩年後，該基金會又給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澳門地名錄》（*Toponímia de Macau*）（兩卷本）頒發了史學獎。1982年，文德泉被評選為澳門年度名人，在他70歲華誕之際，澳門總督透過教育暨青年司在澳門歷史檔案館為他舉辦了作品展。1984年，值其擔任神職五十年之際，羅馬教廷授予文德泉神父以“閣下”（Monsenhor）的尊號。1985年5月27日，文德泉神父在澳門中央圖書館接受了由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Ramalho Eanes）頒發的“成就勳章”（Medalha de Valor）。1989年1月6日，他被接納為葡萄牙歷史學院院士。同年7月10日，文德泉領受了由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頒發的葡萄牙國家最古老的勳章聖地牙哥-斯巴達軍人勳章（Ordem Militar de S. Tiago e Espada）。1998年6月2日，在澳門城市日前夕，澳門市政廳授予文德泉神父“澳門市榮譽市民”（Cidadão Emérito da Cidade de Macau）稱號。

1999年12月19日，文德泉神父不無傷感地出席了最為耀眼的場面——澳門回歸中國的政權交接儀式。2001年5月15日，文神父因健康惡化而動身返回葡萄牙。在機場，文神父對留戀澳門的真誠的朋

友們臨別贈予尊重和祝福的話語。2003年9月15日，文德泉在家鄉的一所他曾經資助過的聖馬爾塔醫院逝世，享年91歲。^{（5）}

文德泉12歲到澳門，在澳門度過了他一生中三分之二的光陰。他既是一名傳教士，又長期擔任教師，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史學大師。他留下120多種著作和300多篇論文，還有大量未發表的文章。這一切是文神父留給後人最為寶貴的財富。正如文神父自己所說：“人生猶如塵埃，名聲亦為過眼煙雲，一切都將飄逝，……唯有我的書長存！”^{（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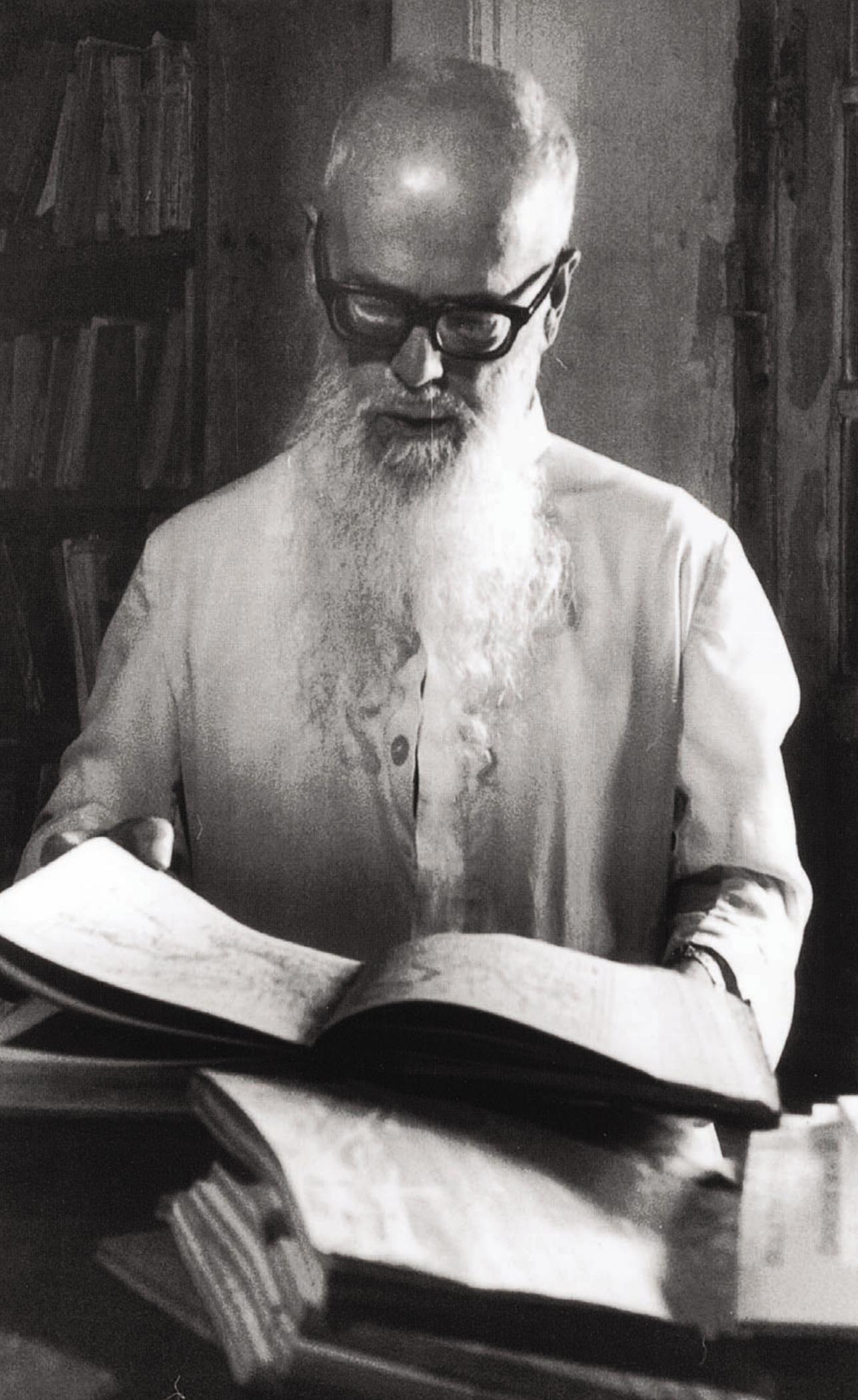
以下就筆者所見，對文德泉神父的主要著述略作評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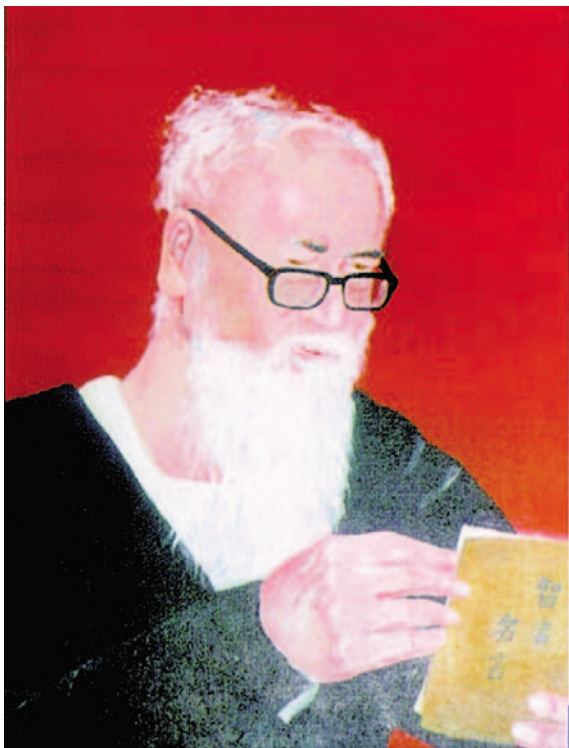
主要著作評介

一、澳門及其主教區歷史

本系列是文德泉神父史學研究的主體，成書時間跨度從20世紀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所佔的份量亦最大。該系列由十六卷組成，其中八卷寫澳門，三卷寫馬六甲，兩卷寫越南，帝汶、中國、朝鮮各一卷。這個系列實際上是葡萄牙東方保教權所轄各教區歷史的全面研究，幾乎可以視為一套多卷本的天主教遠東傳播史。

讀書破萬卷 著述亦等身
(文德泉神父一九九〇年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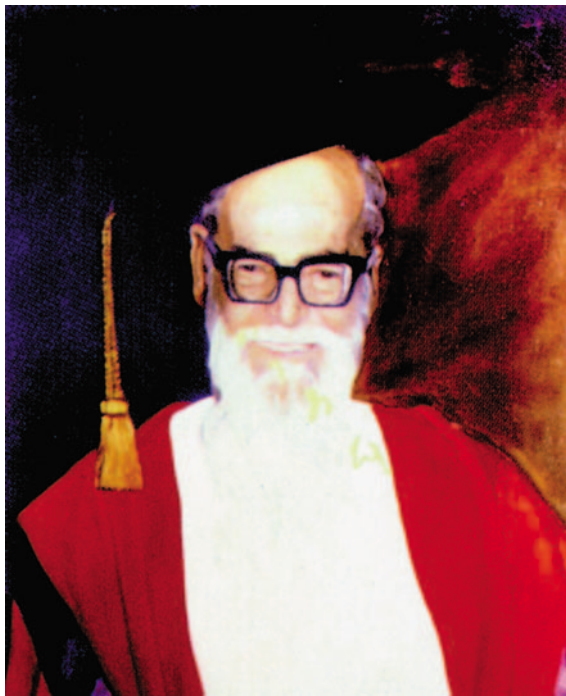


文德泉“蒙席”（或譯“閣下”）（油畫·1995年）作者佚名

澳門被視為天主教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之母，因此，天主教在澳門的生存和發展，自然構成了該系列的中心。第一卷為《澳門及其島嶼》，主要涉及早期中葡關係以及葡萄牙人進駐澳門等問題。第二卷為《澳門主教區的主教與署理主教》，其前三章分別概述了16世紀以前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葡萄牙東方保教權以及澳門主教區的建立，第四章為本卷的主體，以人物傳記的形式，載錄了澳門歷任主教在澳門的活動以及任內在澳門發生的與天主教有關的事件，敘事時間起自首任澳門主教賈內羅，止於19世紀40年代。第三卷為《澳門的宗教修會》，在對遠東地區的各天主教修會作了簡要介紹後，按照來澳的先後順序，詳細考述了耶穌會、方濟各會、聖嘉勒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遣使會各修會在澳門建立和發展的情況。第七、八兩卷為《澳門主教區的神父》，同樣以人物傳記的形式，詳細陳述了在澳門活動的各位神父的生平與活動。第九卷為《澳門的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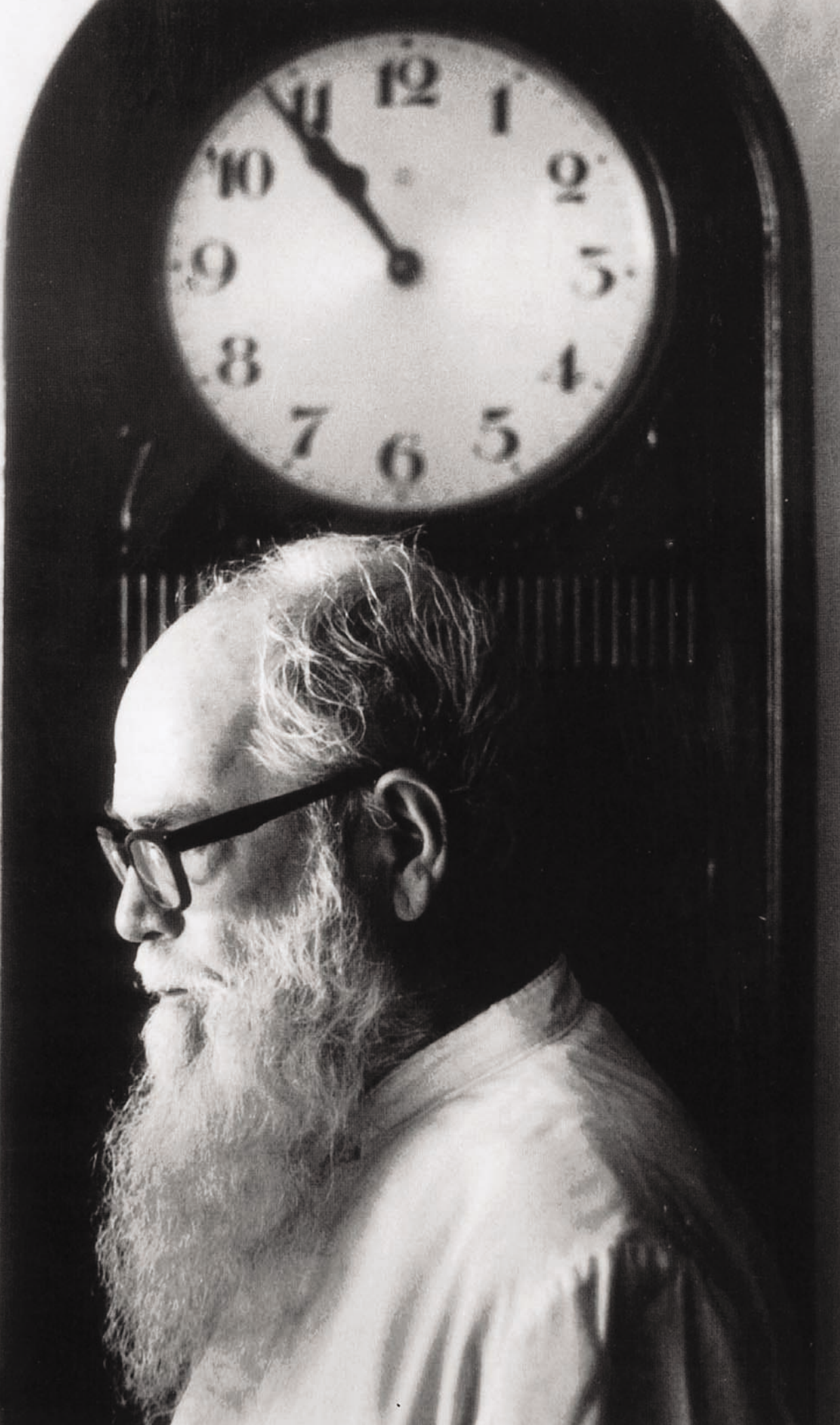
利亞信仰》，詳細考察了以聖母瑪利亞為崇拜對象和保護神的各教堂、炮臺、教士機構、教會學校、有關節日等，並有專章論述馬六甲地區信仰瑪利亞的狀況。第十一卷為《澳門的教友會》。第十二卷為《澳門的主教、教士、教堂與學校》。總之，通過以上各卷，作者對天主教在澳門地區傳播的歷史作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系統的研究。

在重點研究澳門的同時，文德泉也對天主教在馬六甲、越南、中國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進行了研究。第四至六卷分別為《馬六甲的葡萄牙主教區》、《馬六甲教會大事》和《馬六甲的葡萄牙教區》，第十四、十五兩卷分別為《越南的葡萄牙傳教區》和《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第十六卷為《朝鮮教區》。藉此以越南為例作點簡介。《越南的葡萄牙傳教區》由二十二章組成，分為兩大部分，前三十三章考察了交趾支那和東京各教區的建立發展和演變的過程、越南當局的禁教措施、教士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等；後面九章列舉在越南開展傳教活動的天主教神父、傳教士的名單，並以小傳介紹他們的



1985年9月14日澳門東亞大學文學院
頒贈文學榮譽博士學位授予文神父

文德泉神父：智慧與時光的結晶，上帝與澳門同在的沉思者。（九十年代）



活動。《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一書，以大量的原始資料，對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做了系統的專題研究，從而將澳門海外貿易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⁷⁾

二、澳門醫學史

這個系列由四卷構成。早在1967年，文德泉神父出版了《澳門的醫生》(*Os Médicos em Macau*) (一卷本)。多年後，文神父將其加以擴充，寫成了四卷本的《澳門的醫學》。第一卷為《澳門的醫療救助》，前三章引述了三篇有關中國傳統醫學的論文，四、五兩章分別論述了澳門城市的衛生狀況，醫療保健水平，敘事時間跨度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6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別關注衛生狀況與人口增減變動之間的關係。第六章專論澳門的麻瘋病人，包括仁慈堂、政府當局對患者的處理，描寫了20世紀20-60年代的麻瘋病院。第七章描述了霍亂病，披露了多個年份上的有關統計資料、特別是20世紀幾次霍亂流行的情況。第八、九兩章分別討論鼠疫和天花病。

第二卷為《澳門疾病分類學》，記載了澳門各個時期的各類藥房和藥劑師、仁慈堂醫院、聖熱努阿里奧(S. Januário)軍人醫院，澳門的衛生服務水準、社會的救助活動。所述拉法埃爾醫院內容甚為詳細，從其開始一直寫到20世紀30年代。另外，還有專節描述了鏡湖醫院和中國醫生的活動。

第三、四兩卷為《澳門的醫生》。第三卷涵蓋16-19世紀，第一、二兩章分別講述在中國和交趾支那的耶穌會醫生的活動，接下來重點講述17-19世紀裡傳教士醫生在澳門的活動，最後一章專述荷蘭、英國、美國、中國等國醫生在澳門的活動，而對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亦有較詳細的記述。第四卷為20世紀的澳門醫生，以人物傳記形式，較詳細地考述了多名醫生在澳門的社會醫療活動，始於1900年帕利亞(José Filipe de Morais Palha)來澳，止於1975年7月菲亞略(Mariazinha Teotónia Martinha Meirene Beda Luís e Fialho)出任二級醫生，可看作一部當代澳門醫療衛生史巨著。⁽⁸⁾

三、澳門編年史

1) 《16世紀的澳門》

該書是文德泉神父編寫的一部資料性的澳門斷代史。逐年載錄澳門歷史大事，彙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如若干年份澳門的人口數目及其構成，基督教各修會在澳門的建立及其活動，1564年葡人助廣東官府鎮壓兵變的經過，賈內羅抵澳後的教務活動，耶穌會在澳門創辦的第一所教會學校，1557-1578年中葡商人貿易的地點，1578年後葡人每年兩次的廣州季節貿易，1584年前後澳門葡人納稅方式由繳納藥品到支付白銀的轉變，1586年王家敕令對澳葡司法權的規定，1587年的王家大法官條例，聖保祿學院的發展規模，1594年關於禁止西班牙的西印度與葡萄牙的東印度之間特別是澳門與馬尼拉之間貿易的王室敕令等。

書中還直接摘錄或節選了一些檔案和文獻資料，如若干通關於澳門居留地的建立及其早期發展的信函，1621年澳門聖保祿學院院長的一篇載有澳門地租起源的手稿，1584年菲律賓的西班牙官員寫於澳門的一篇報告，卡爾丁神父對聖保祿學院的記述等。⁽⁹⁾

2) 《17世紀的澳門》

這是文德泉神父的第二部澳門斷代編年史，編寫方法與《16世紀的澳門》相同，即以彙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二手資料為主，同時也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原始文獻資料。書中的內容涵蓋了17世紀澳門歷史的各個方面：澳門海外貿易的繁榮，澳門葡人向南方尋求新市場的努力，耶穌會士在澳門、中國、日本和東南亞的活動，澳葡當局與中國官府的關係，澳門葡人社區內部自治的運作，澳門的人口結構及社會生活，澳門城市建設的發展等。書中引述的檔案和文獻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澳門人保祿·達·特林達德《東方的精神征服》(寫於1631-1636年間)中對澳門的記載，法利亞·蘇薩在《葡屬印度》中對澳門黃金時代的描述，1651年澳門總督致葡印總督的信，澳門聖保祿學院院長卡爾丁《耶穌會的戰鬥》(寫於1650年代)中對該學院發展的記載，1689年葡印總督給澳葡當局的令狀對澳葡自治機構權利的調整，1622年的一個文件對中國官



文德泉神父在澳門聖若瑟教堂（七十年代）



Anos 80 • Com Rainha Margarida da Dinastia e o Príncipe Henrique, em Macau

文德泉神父帶領丹麥瑪格麗達女王和恩克里王子一行參觀澳門的中國廟宇（80年代）

員抵制葡人修建防禦工事的記載，1622年荷屬巴達維亞總督的信對澳門設防狀況的記述，1672年克萊芒對澳門炮臺及其設施的記載等。

書中彙集的有關澳門葡人自治社會內部運作、澳門人口結構以及澳門城市建設的內容，見諸中文史籍的記載比較少，因而尤其應該受到我國學者的注意。諸如，澳門船隊司令和澳門總督的名單，議事會對總督必要性的疑議，葡印當局對澳門-日本貿易體制的規定，司庫任期的變化，葡印當局出售航海權對澳葡當局的影响，1686年澳門葡人的內部衝突，1689年葡印當局給澳葡當局的特許令等。我們要研究澳葡當局與明清政府的關係，澳葡自治的性質或者將澳葡自治與歷史上的“番坊”進行比較研究時，這些資料和文獻不可不讀。再如澳門教堂的新建與重建，1612年澳葡為說服中國官員允許修建防禦設施而作的努力，1612、1622年的城市建設工程，1621、1622年澳葡防荷備戰的活動，1622年的城市建設及其費用，1626年澳門城的防禦設施，1629、1633、1638年澳

門炮臺修建工程的進展，1639、1642、1672年澳門的防禦設施等。這方面的資料對於研究澳門城市建置和發展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其中的幾篇時人記述，更是研究該課題的重要史料依據。

書中含有許多關於海上貿易的內容，例如澳門商船的噸位、往返中日間的航期，1600年前後中日兩國市場上的絲貨價格，1578-1638年間某些年份葡人自澳門運入日本的絲貨，1590-1600年澳門葡人向日本出口的黃金，1599、1633-1638年澳門葡人在日本市場的售後所得，1622年澳門葡人得自澳門—馬尼拉貿易的收入，1630年代澳門與帝汶、望加錫貿易的非壟斷制，1634年澳門—馬尼拉貿易的暫時中斷，1630年代澳門議事會向進出澳門港口的葡萄牙船所徵收的稅率，1647年中國官員下澳丈量葡船並徵收船鈔，1649年進口到澳門的商品以及從中國經由澳門輸入馬尼拉的商品，1665年兩廣總督派人到澳門以容許澳門商船航行為由向葡人索得4000-5000兩的賄賂，1666-1667年廣東官府對澳門



1990 • Em trabalho

文德泉蒙席在歷史領域蒐索鑽研長達七十多年其博碩通識的人文精神令中外學者敬重

商船的封鎖，澳門商船及貨物的損失，1684年中國在澳門建立海關，京官來澳門開放海上貿易並恢復向澳門葡人徵收貨稅與船鈔等。⁽¹⁰⁾

3) 《18世紀的澳門》

這是文德泉神父編寫的第三部澳門斷代史。與前兩部相比較，《18世紀的澳門》不僅份量成倍擴充，長達750多頁；而且在編纂方法上也有顯著不同，即除繼續彙集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資料外，大幅度增加了原始文獻和檔案的輯錄量，並且作了大量的考證，因而大大提高了該書的學術價值。作者除

大面積節錄前述《澳門檔案》第三系列各冊中的市政廳文件外，還從《1710-1789年議事會來往信函》、《殖民地檔案》等文獻中節選了大量官方文書和當時人的記載。對於這些文件，作者大都說明它們的屬性，並註明所引段落的出處。這樣，既保持了學術著作本身的嚴肅性，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檢索的方便。

作為研究澳門史的一部重頭作品，該書提供了大量為它書所不載或語焉不詳的有關18世紀澳門海上活動的重要資料，涉及澳門海上生活的各個方面：澳門商船出航返埠的時間和航行目的地，澳門

議事會對進口稅率的調整，澳門港商船數的增減及航行目的地的變遷，若干年份澳門海上貿易狀況的報告，葡印當局和澳葡當局對海上貿易的指令和規定，外國商船在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澳門一帶的活動等。與同時代出版的其它澳門史著作相比，《18世紀的澳門》所提供的有關18世紀澳門海上貿易史的資料最為豐富，例如，1704年澳門議事會決定的稅率，1750年澳門通往東京的航行，1754年一艘澳門商船前往印度裝運鴉片，1755年在運的澳門商船數，1770年澳門港的商船數及其航行目的地，1772年澳門港口的商船數等。這些資料大部分為它書所不載，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¹¹⁾

四、專題研究

1) 葡萄牙人定居澳門

這個專題是文神父較早涉獵的問題之一，並且多次撰文加以闡述。早在1939年，文神父在《澳門教區月刊》上發表〈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一文。關於葡萄牙定居澳門的時間，他徵引了平托《遠遊記》中的記載及其1555年11月20日自澳門發出的信，認為此一日期為1557年。接着，作者以較大篇幅討論了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的方式。為此，作者先後徵引了法里亞—索薩(Faria e Sousa)的《葡屬亞洲》(*Asia Portuguesa*)、曾德昭(P. Álvaro Semedo)的《大中國誌》(*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索薩(P. Francisco de Souza)的《被征服的東方》(*Oriente Conquistado*)、杜赫德(Du Halde)的《中國誌》(*Description de la Chine*)等書中的有關文字，然後總結說：

從各國作者的所有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儘管1557年被不可爭辯地認為是正式佔據澳門的日期，但關於這個殖民地建立的準確時間和導致其建立的事實，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¹²⁾

該文的基本觀點收入1940出版的《澳門及其主教區》一書。⁽¹³⁾這裡，他對“葡萄牙人幫助明朝剿滅海盜而得澳門”的說法似乎不置可否。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他與傑薩斯有顯著的不同，既沒有像

傑薩斯那樣堅稱那些17-18世紀的著作中的說法是可靠的事實，也沒有像他那樣激烈地批判龍思泰，一味斥責其對驅盜得澳說的否定是故意歪曲、污蔑、誹謗葡萄牙人。應該說，在這一點上，與他的同胞相比，文神父保持了一個歷史學家應有的冷靜和嚴肅態度。

經過長期的研究之後，1967年，文神父發表了〈澳門的建立〉這一長篇文章，繼續對這個問題加以闡述。該文章首先明確作出結論：

四十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於揭開澳門起源之秘密。一個傳說稱：澳門在1557年被讓與葡人，以作為剿滅為害南中國海的中國海盜的獎賞。然而，在仔細考察了中葡文獻和所有流傳至今的各種說法後，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1) 經中國人的同意，葡萄牙人約在1557年定居澳門，以便與中國人通商；2) 葡人之定居澳門，不是某種戰鬥的獎賞；3) 與海盜的戰鬥實際上不是在1557年，而是在1564年；4) 此次與海盜作戰之結果，使葡人在澳門的定居得到確認；5) 之所以產生出作為驅盜獲勝的獎賞



文神父參觀澳門一個畫展（90年代）



文德泉神父、博克塞教授（中）和崔樂其先生合影（1985年）

而於1557年將澳門讓與葡人的說法，是因為混淆了兩件事，將1564年的事件推前到了1557年；6）沒有任何一道皇帝諭旨正式確認葡人在澳門的定居。^{（14）}

在引出全文結論後，作者展開了具體的論證過程。在引述《澳門記略》等中文資料外，重點徵引了有關的葡文史料。在徵引平托《遠遊記》第221章中的記載和埃武拉檔案館藏的一份手稿後指出：“根據平托和埃武拉手稿的記載，是廣東官員准許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的”。文神父在徵引了克路茲的《中國概說》後作出了合理的推論說：

克路茲沒有提到當時葡萄牙人與海盜作戰之事。（……）在克路茲到廣州前不久，巴雷多神父也曾到過廣州，他還與平托一起訪問了浪白濤和澳門。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海盜。再者，既然這些神父們於1555年到過澳門，那麼，澳門就不可能在1557年還是海盜的巢穴。

在引出了平托1555年12月20日寫於澳門的信後，進一步指出：“由此可見，1555年葡萄牙停留的港口是浪白濤，但也到過澳門，因此，澳門不是海盜的巢穴。”接下來徵引了貢薩萊斯神父（Pe. Gregorio Gonzales）寫於1570年前後的信，賈內羅主教（Bispo Carneiro, S. J.）1575年對澳門的描述，1577年的一份文件，范禮安等幾位耶穌會士1601-1614年間的記載，議事會書記官雷戈（Diogo Caldeira do Rego）1623年的報告等，然後分析說：

從上引文獻可以看出，沒有任何一條16世紀的中葡史料提到1557年有一場同海盜的作戰。相反，所有文獻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即葡萄牙人是在廣東當局知情和同意的情況下定居澳門的。沒有任何一份當時的文獻提到任何一道將澳門割讓給葡萄牙的金割、協定或官方文件。

在1564年發生了一場與海盜的戰鬥，葡萄牙人參與協助中國人。這次勝利進一步確認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住；中國人出於對葡萄牙人的感謝，同意我們在澳門定居。在16世紀，沒有



1993年5月在澳門舉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峽兩岸的文史大家和中外專家雲集盛況空前。文德泉神父（前排右一）作為澳門文化研究會顧問出席會議，曾撰文〈思想的種籽〉（右下圖）贊揚這次會議。照片中前排：梁披雲（右五）、梅可望（右六）；第二排：季羨林（右五）、饒宗頤（右六）、任繼愈（右七）。與會名家學者逾七十人。

任何一份文件提到1557年與海盜的戰鬥；祇是到了17世紀，歷史學家們才開始談論那一年發生了與海盜的作戰，作為結果，中國人將澳門給了我們。這裡無疑混淆了日期，因為第一次與海盜的作戰發生在1564年，而那是中國當局第一次請葡人助戰。中國皇帝從不知道這一安排。⁽¹⁵⁾

為了說明兩次事件的混淆，作者從潘日明神父整理的《澳門創建者的信函》中徵引了直接描述1564年作戰情況的原始文件，即1564年12月安德列·平托（Irmão André Pinto, S. J.）和佩雷斯（Pe. Francisco Perez）寫於澳門的兩封信，並注意到了重要的一點，即安德列·平托明確地說：“廣東總督接受了葡萄牙人的援助，而中國以前從未同意接受任何外國的援助。”⁽¹⁶⁾這裡明確地提到1564年是中國官府第一次請葡萄牙人助戰。

最後，引述了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卡爾丁（Pe. 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的《日本紀事》、1629年議事會給菲利普三世的呈請書（Representação de 1629）、杜赫德的《中國誌》、法里亞—索薩的《葡屬亞洲》、阿茹達圖書館所藏的一份17世紀的手稿、克萊門特修士（Pe. frei João Martí Clement, O. F. M.）1672年對澳門的描寫、1699年北京耶穌會士的記述、納瓦萊特（Frei Domingo Fernandes Navarrete）的報道、索納拉（Sonnerat）的《東印度、中國遊記》、索薩的《被征服的東方》、瑪利亞的《中國日本之亞洲》等17-18世紀的著述。他的結論是：1557年的戰鬥是“虛構出來的戰鬥”（imaginada batalha）。⁽¹⁷⁾

這篇文章中的基本結論先後收入1976年的《澳門的軍人》第一版、1984年的第二版和1990年的《澳門的起源》。⁽¹⁸⁾

在1981年出版的《16世紀的澳門》一書中，作者進一步肯定了〈澳門的建立〉一文中所得出的結論。他在考察了若干份16世紀50-60年代的葡萄牙文獻後指出：

這些是僅有的關於澳門建立的同時代的文獻（documentos coevos），其中祇有門德斯·平托提到了1557年這個日期；而沒有一處提到任何一場同海盜的戰鬥。（……）這次戰鬥不是發生在1557年，而是在1564年，事後，廣東官府確認了（我們在）澳門的居留。正如聖保祿學院院長卡布里爾·馬托斯在1621年的手稿中所講的那樣。

接着又徵引《澳門記略》、龐尚鵬的〈撫處濠鏡澳夷疏〉、郭尚賓的〈防黎防澳疏〉、《明史·佛郎機傳》等中文資料，並總結道：

上述作者所揭示的中國人對澳門建立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相一致。……由此，我們確信已經揭開了關於澳門建立的秘密。^{（19）}

綜上所述，文德泉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值得注意。其一，如果說文神父1939年的文章對曾德昭等人的說法還是不置可否的話，那麼，他在1967年的文章則已經形成了明確的結論，而且堅持了三十多

年未曾改變。所謂早期的文德泉認同曾德昭之說，而後來的否定是受了戴裔煊影響的說法^{（20）}，實為無稽之談。其二，他拋棄了傑薩斯和白樂嘉等人的偏激立場，尊重龍思泰的不同觀點，其論證過程比較嚴密，研究結論也更加客觀、公正。其三，他非常重視“同時代的文獻”，尤其是注意到了1564年信函稱那次助戰是中國首次請葡萄牙助戰的記載，從而使他的結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

2）澳門土生葡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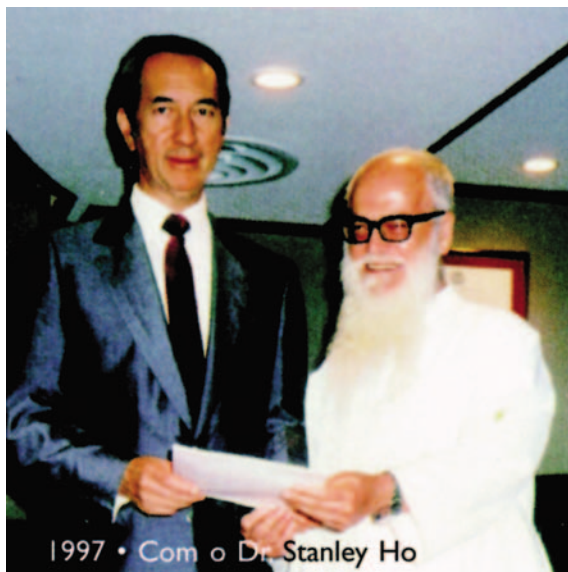
土生葡人的種族構成問題，是學者們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早在1897年，本托·達·佛蘭薩在他的《澳門及其居民，與帝汶的關係》一書中曾指出：澳門土生人是非常純正的人種。在他們身上，某些整體線條以蒙古人的基本特徵為主，同時也具有歐洲人、馬來人和加那利人的外型；它是由偶然所為之反復通婚造成的人種與亞人種大混雜的產物。^{（21）}之後，阿爾瓦羅·德·梅洛·馬沙多在1913年提出：澳門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同日本女人、馬六甲女人、乃至近期與中國女人通婚的產物。^{（22）}由此可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葡萄牙學者的觀點就產生了一個明顯的分歧：佛蘭薩沒有提到葡萄牙人與華人的通婚，而馬沙多雖然提到，但認為這種通婚是20世紀初才開始的。

1950年，雷戈在其《澳門》一書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不瞭解澳門的大主教們十分錯誤地推斷，澳門土生人是歐洲人與中國人或是經洗禮獲得葡萄牙籍的中國人通婚的產物。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不被接納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從本世紀（20世紀）才有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的情況，但是並不多見。這使我們更加確信，在我們所說的澳門土生人的血管中流淌中國人的血液是極為罕見的事。因此，我們認為對澳門土生人的起源已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即出生在澳門，既非歐洲人的後代，亦非中國人後代的那些人。^{（23）}這位葡萄牙學者斷然否定澳門土生葡人的種族構成中有華人的血統。

1965年，文德泉神父出版了《澳門人》一書，針對上述觀點展開了自己的論述。他引用同時代的材料（as testemunhas contemporâneas），認為第一代澳門土生是葡萄牙人與印度、馬來亞婦女通婚的



文德泉神父與同袍澳門天主教會著名的歷史學家潘日明神父一道鉤沉索隱（1983年）



文德泉神父和何鴻燊博士（1997年）

產物。大約1563年以後，葡萄牙人與日本人、尤其是中國婦女的通婚產生了第二代澳門土生。17世紀上半期，隨着日本對天主教的迫害，開始出現了葡萄牙人娶日本婦女為妻的現象。接着，他引用博卡羅、芒迪和達瓦羅三人分別於1635年、1637年和1638年對澳門的描述，得出結論：澳門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與馬來亞、中國、日本及其他婦女通婚的產物。

針對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通婚是從20世紀初才開始的論點，文德泉提出了不同意見。他首先從神父的授聖職記錄中找出了出生於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三十一位具有華人血統的神父的資料，證明17-18世紀葡人中間已有通婚。為了證明華人血統在澳門土生葡人血統佔有重要比例，他還列舉了1777-1784年大堂區結婚登記、1802-1831年大堂區洗禮登記、1807-1813年瘋堂洗禮登記以及1822-1870年的結婚登記的資料。⁽²⁴⁾

1974年，白姐麗在《澳門語言：歷史與現狀》一書中，對文德泉的上述觀點提出不同意見。她說：語言的證據可以導致與中國女子通婚佔大多數的論斷稍微不同的結論。當然，一些中國女性則應會有的，但是，為甚麼在19世紀以“克里奧語”所寫的文章中，馬來語的詞語幾乎是源於中國的詞語的兩倍？⁽²⁵⁾對此，文德泉首先補充了新的材料，如桑切斯神父1582-1585年間對澳門的描述，羅曼於1584

年的見聞以及一位耶穌會士1625年的記載等，堅持認為，基於同時代的可信的文件，我們依舊斷言，相對於其他種族的女性來說，中國母親在澳門土生葡人的血緣中佔大多數。文神父接着指出：在上個世紀（19世紀）的土語中馬來亞詞語遠遠多於漢語辭彙，是因為印度女子和馬來亞女子先於中國女子同葡萄牙人通婚。可見，他認為這一點不能證明“澳門土生葡人血統中華人血統僅僅是一些”的論斷。⁽²⁶⁾

文德泉神父與中國澳門史學界

正如前文所述，文德泉神父從上世紀40年代起陸續出版和發表有關澳門歷史的重要論著。但是卻遲遲未被譯介到中國學術界。90年代以前，由於主客觀條件的諸多限制（如對外交流渠道不暢，語言障礙等），研究澳門歷史的中國學者所接觸到的祇是西方學者撰寫的幾種英文著作，如龍思泰的《葡萄牙人在華居留地史綱》、傑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白樂嘉的《西方開拓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以及博克塞的《葡萄牙紳士在遠東》、《來自澳門的大帆船》等，對葡萄牙學者用葡文所完成的研究成果甚少瞭解，更未能利用他們所整理和出版的葡文檔案和文獻資料來開展研究。因此，使得我國學者在研究的規模和視野等方面均有較大的局限性。

90年代以來，此種狀況逐漸得到改變。首先是澳門文化司署主辦的《文化雜誌》，開始陸續刊登有關澳門歷史的葡文研究成果（包括史料），文德泉神父的研究成果開始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四百週年——澳門印刷業〉（第6期）、〈第一個中國耶穌會神父〉（第10期）、〈澳門的日本人〉（第17期）、〈關於澳門土生葡人的傳說〉和〈澳門土生葡人的由來〉（第20期）、〈作為皇家使者的一名耶穌會士墓葬〉（第21期）、〈三個美國佬在澳門〉（第27/28期）等。這些文章刊登出來後，多被中國學者所徵引，對中國學術界的澳門史研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開始直接利用葡萄牙學者、特別是文德泉神父的研究成果開展研究工作。澳門基金會的吳志良先生在南京大學攻讀博

士學位期間，開始介紹並引用文德泉神父的研究成果。吳先生在〈澳門史研究述評〉一文中，對文神父的澳門史研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澳門教區簡報》更成為澳門史研究的陣地，特別是30至50年代，博克塞、白樂嘉、文德泉神父等挖掘整理了不少原始和失傳的珍貴澳門史料，在《澳門教區簡報》上刊登評介，為澳門史研究的進一步推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前述著作和作者，初步奠定了澳門史研究的基礎，尤其是博克塞和文德泉兩人，在整理檔案史料方面功高勞苦，著作等身。

文德泉更孩童時便來澳門，畢生投入傳教史和澳門史研究，專著百數種，所涉之廣，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儘管有人批評他許多時候祇羅列資料，不指出來源，令引用者提心吊膽，但史料得以保全，他仍功不可抹。文神父的著作多在澳門出版，其十六卷的《澳門及其教區》以及《17世紀的澳門》、《18世紀的澳門》等，堪稱澳門史料大全，是澳門史學者經常翻閱的參考書。⁽²⁷⁾

不僅如此，吳志良博士在其博士論文的寫作中，還多處引用了文德泉神父的研究成果和資料，如〈澳門議事會〉(*O Leal Senado*)，〈澳門的起源〉(*Primórdios de Macau*)，〈19世紀澳門名人錄〉(*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XIX*)，〈澳門的軍人〉(*Os Militares em Macau*)等。他還對文神父關於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看法給予充分肯定。⁽²⁸⁾另外，在其後的多篇文章中譯介了文德泉神父的著作。總之，吳志良博士是90年代以來較早大面積運用文德泉等葡萄牙學者的葡文成果開展澳門史研究的中國學者之一。

1994年10月，筆者考入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開始接觸文德泉神父等葡萄牙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論文開題報告的學術史回顧部分，介紹了文德泉的重要著作《18世紀的澳門》和《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²⁹⁾，在博士論文的寫作中徵引了其中的

一些檔案文獻資料⁽³⁰⁾。畢業後，繼續搜集葡萄牙學者的著作和論文，撰寫了〈澳門史葡文史料舉要〉一文，其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文神父的《16世紀的澳門》、《17世紀的澳門》、《18世紀的澳門》三本書的史料價值。⁽³¹⁾此外，在多篇論文中引用了其中的結論和資料，例如《16世紀的澳門》和《澳門的開端》兩書中關於“葡人驅盜得澳說”的研究結論；《17世紀的澳門》中對路易斯·達·伽馬(Luis da Gama)的日記的披露；《18世紀的澳門》中關於澳門海上貿易的資料等。⁽³²⁾

李向玉博士在廣州中山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引用了文德泉神父《澳門及其教區》和《澳門的教育》中的若干資料，並對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所給予的幫助表示了誠摯謝意。⁽³³⁾

近期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的董少新博士，在攻博期間努力學習葡文，致力於搜集澳門史的葡文資料，在其博士論文中介紹了文德泉神父的四卷本《澳門醫學》，並徵引了其中一些重要資料。⁽³⁴⁾

總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澳門史學界，出現了一批(儘管人數尚不算多)直接引用葡萄牙學者的葡文成果的研究人員，文德泉神父的研究成果不斷地被譯介到中國學術界。他們都對文神父的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並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引用。通過各自的努力，他們在所關注的領域使相關問題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昇，澳門史研究領域中葡學者長期以來“雙軌並行”的局面有所改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們不想說文神父對所有問題的研究都很詳盡，每個結論都令人信服。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他的那一百多種著作和數百篇論文，已經為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其研究成果的任何漠視或藐視，都將是狹隘的。不僅如此，作為20世紀澳門歷史的見證人，其著作中有關20世紀的內容，本身就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完全可以相信，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研讀文神父的著作，將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活動的一條重要途徑，甚至於應該肯定地說，對文德泉本人的研究，亦將成為未來澳門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註】

- (1) 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 *Os Extremos Conciliam-s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161.
- (2) Padre Régis Gervais, 著有《澳門簡史》(*Histoire Abrégée de Macau*)，北京，1928年出版。
- (3) 先後成為公立殷皇子中學和澳門天主教青年組織的喉舌。
- (4)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rquivos de Macau*, 1ª Série, 3 vols., Macau, Imprensa Oficial, 1929-1931; 2ª Série, 1 vol., 1941; 3ª Série, 32 vols., 1964-1978.
- (5) 參見 Paulo Coutinho, “Monsenhor Macau”, in *Macau*, II Série, No. 31, Macau, 1994, pp. 89-103; Jorge Arrimar, “Apontamento Biográfico”, in *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 - O Homem e a sua Obra*, Macau, 1999, pp. 5-7; Nota do Editor, “Retalhos de Uma Vida”, in *Revista de Cultura*, Edição Internacional, 8, Macau, Outubro 2003, pp. 16-17.
- (6) *Revista de Cultura*, Edição Internacional, 8, Macau, Outubro 2003, p. 16.
- (7)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 *Macau e as suas Ilhas*, 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Salesiano, 1940; Vol. II: *Bispos e Governadores do Bispado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0; Vol. III: *As Ordens e Congregações Religiosas em Macau*, 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56-1961; Vol. IV: *A Diocese Portuguesa de Malaca*, Macau, Tipografia Salesiana, 1957; Vol. V: *Efemérides Religiosas de Malac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1963; Vol. VI: *A Missão Portuguesa de Malac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1963; Vol. VII: *Padres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7; Vol. VIII: *Padres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9; Vol. IX: *O Culto de Maria em Macau*,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9; Vol. X: *A Missão de Timor*,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5; Vol. XI: *As Condições em Macau*,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5; Vol. XII: *Bispos, Missionários, Igrejas e Escolas*,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6; Vol. XIII: *A Missão da China*, Macau, 1977; Vol. XIV: *As Missões Portuguesas no Vietnam*,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Vol. XV: *Relações Comerciais de Macau com o Vietnam*,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7; Vol. XVI: *A Missão da Coreia*, Macau, 1979.
- (8)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 *Assistência Médica em Macau*, Macau, 1975; Vol. II: *Nosologia em Macau*, Macau, 1976; Vol. III: *Médicos em Macau*, Macau, 1976; Vol. IV: *Médicos em Macau*, Macau, 1976.
- (9)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1.
- (10)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 (11)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XV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1984.
- (12) Padre Manuel Teixeira,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36, N° 429, 1939, pp. 279, 280-283.
- (13)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 *Macau e as suas Ilhas*, 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Salesiano, 1940, p. 46.
- (14) Padre Manuel Teixeira, “Fundação de Macau”,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5, N° 750, 1967, p. 152.
- (15) Padre Manuel Teixeira, “Fundação de Macau”,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5, N° 750, 1967, pp. 157-166, 170-172.
- (16) Padre Manuel Teixeira, “Fundação de Macau”,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5, N° 750, 1967, pp. 173-178; 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 “Cartas dos Fundadores”,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2, N° 724-725, p. 755.
- (17) Padre Manuel Teixeira, “Fundação de Macau”,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5, N° 750, 1967, pp. 178-188, 192.
- (18)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1ª edição,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15-16; 2ª edição, Imprensa Nacional, 1984, pp. 15-16; Padre 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p. 11.
- (19)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 pp. 36, 41.
- (20) 湯開建〈就《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質疑〉答張廷茂博士，〈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5期，澳門文化局2002年，頁201。
- (21) Bento da França, *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897, p. 197.
- (22) Álvaro de Mello Machado, *Coisas de Macau*, Lisboa, Livraria Ferreira, 1913; 2.ª ed., Kazumbi - Editora Multimedia Lda., 1997, p. 65.
- (23) Francisco de Carvalho e Rego, “Macau”, in Carlos Pinto Santos & Orlando Neves (eds.), *De Longe à China: Macau na Historiografia e na Literatura Portuguesas*, Tomo III,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 1013, 1014, 1016, 1017.
- (24)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acaenses*,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5, pp. 19-20, 21-24, 67-71, 73-78.
- (25)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17。
- (26)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97、198。
- (27) 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頁52-53、54。
- (28)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頁53、59、63、66、96、97、125、186、293、345。
- (29) 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研究的回顧與設想〉，《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12期，頁4-5。
- (30) 張廷茂《16-18世紀中期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廣州暨南大學1997年5月打印稿。
- (31) 張廷茂〈澳門史葡文史料舉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9期，頁22-23。
- (32) 張廷茂〈對《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質疑〉，《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0/41期，澳門文化局2000年；〈清初遷海與禁海時期澳門的海上貿易〉，《文化雜誌》第44期，澳門文化局2002年；〈清康熙時期遠東商業優勢的爭奪——論澳門與巴達維亞的貿易關係〉，《江海學刊》2003年第3期，頁159、162。
- (33) 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頁42、53、66、70-71、84、97、123-130、164-166、169、245。
- (34) 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廣州中山大學2004年5月打印稿，〈導言〉及第一章。

文德泉神父作為澳門史家的鮮明形象令學者緬懷於今（九十年代）

